

中国
文化
知识
大观
园

科技军事卷

辽海出版社

军事思想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科技军事卷 •

军事思想

(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辽海出版社

目 录

一、军事思想史	(1)
卜辞反映的军事思想	(1)
西周的军事思想	(3)
春秋军事思想	(6)
战国军事思想	(17)
《吕氏春秋》军事思想	(42)
西汉的军事思想	(45)
东汉的军事思想	(52)
三国的军事思想	(56)
唐朝的军事思想	(62)
北宋军事思想	(70)
南宋军事思想	(77)
明代军事思想	(83)
清代前期军事思想	(95)
清代后期军事思想	(105)

二、军事家的军事思想	(114)
伊尹	(114)
吕尚	(118)
管仲	(121)
吴起	(126)
墨翟	(138)
商鞅	(140)
嬴政	(146)
韩信	(149)
周亚夫	(152)
卫青	(159)
刘彻	(164)
刘秀	(169)
曹操	(172)
诸葛亮	(175)
李世民	(178)
赵匡胤	(181)

一、军事思想史

卜辞反映的军事思想

卜辞是把商时期人们在甲骨上所刻的有关占卜结果的文字记录，其中有较多的关于军事活动的记载，反映了殷商时期人们对军事活动的朴素认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注重战前兵员的征集

如：

贞：引妇好先共人于庞。

贞：兹乎妇好先于庞共人。

这里的“先”有先导之意；“共”与“登”同义。“登人”，王襄解释为：“登人疑即《周礼·大司马》比军众之事。将有征伐，必先聚众。”卜辞的意思是说，是否命令妇好为先导部队，在某地征兵聚众。又记载：

辛巳卜，争，贞：今载王登人，乎妇好伐土方，受（授）有又（佑）。五月。

今载，即今年，卜辞的意思是说，今年商王征集了兵员，准备命令妇好率军队去征伐土方，能受到上帝的助佑吗？

关于步伐

卜辞记载：

贞乞令我史步伐舌方。

贞禽乞步伐舌方受有又（佑）。

贞今载王其步伐夷。

这里表明，殷人在征伐战争中主要是以步卒作战。

关于逆伐

卜辞记载：

贞王勿逆伐舌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佑〕。

贞舌方其来，王勿逆伐。

所谓“逆伐”，就是正面迎击。

关于值伐

卜辞记载：

贞今载王值伐土方。

贞多……不其值伐舌方。

“值伐”之值意为“正”，所以它是正伐、挾伐的意思，也就是以兵威抚循之。

伏击思想的萌芽

卜辞中虽无“伏击”两字的记载，但已有这一思想萌芽的反映。有两条卜辞这样记载：

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玪戛伐巴方，王自东骚伐，戎阱于妇好立。

贞妇好其〔从〕玪戛伐巴方，〔勿〕自东骚伐戎阱于妇好立。

“立”本义是站立，这里用作“位”字讲，“戎阱于妇好立”，意思是敌人陷入妇好的阵地。这两条卜辞从正反两个方面卜问：妇好协同玪戛征伐巴方，武丁亲自率领部队由东边作骚扰性进攻，敌方会陷入妇好的埋伏圈吗。商王不从东边作骚扰性进攻，敌方会陷入妇好的埋伏圈吗。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伏击战思想的萌芽。

西周军事思想

《易经》

《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约产生于西周初期，其内容极其广泛，其中也包含有军事思想。宋王应麟在《通鉴答问》中说：“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其理一矣。”《易经》中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某些卦的爻辞之中，具体地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反对恃强凌弱。《易经》这一思想充分地体现在《兑》卦之中。“初九”爻辞说：“和兑，吉”。意思是说，国与国之间需和谐共悦，才能吉利。“九二”爻辞：“孚兑，吉。悔亡。”这是说，国与国之间以诚信相待，就会吉利，如有反悔，就会灭亡。“六三”爻辞：“来兑，凶。”说的是某一国家依靠强大的武力去威胁别国，强迫其服从自己意志，便是凶。

主张师出有名和进行自卫性的防御作战。《易经》虽然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反对恃强凌弱，但并不绝对地反对战争。它认为进行战争首先要做到师出有名。《谦·上六》爻辞说：“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如不得已进行战争，在战前则必须取得道义上的主动。

《易经》主张自卫性的防御作战。《蒙·上九》爻辞说：“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意谓攻打愚昧、昏乱之国容易取胜，主动去侵略别国不利，进行自卫性的防御作战则有利。

对民众在战争中作用的初步认识。《晋·六三》爻辞说：“众允，悔亡。”如果能得到众人的信任，取得战争的胜利便没有困难了。《观·六三》爻辞说：“观我生，进，退。”观察了解我“生民”的意愿，以此来决定战争中的进和退。这些可谓是最初的关于民众在战争中重要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虽是简单的，

但对后世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主张保持戒备状态。《易经》认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小心谨慎，提高警惕。对战争来说，更应做好戒备，否则，就会遭到失败。《泰·六四》爻辞：“不戒以孚”，即是这层含义。

对军队纪律的重要性的认识。《师·初六》爻辞说：“师出以律，否臧，凶。”其意是说，军队出征打仗要执行严格的纪律，不然就会打败仗。这是中国古代关于军队纪律重要性的最初认识。

对战争与地形关系的认识《易经》主张军队在驻营时要注意选择有利的地形。《需·初九》爻辞说：“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一九三”爻辞说：“需于泥，致寇至。”指出军队驻扎在郊野，利于久驻，而无灾患；如驻扎在泥泞之地，敌寇便会乘机而来。

作战指导思想。《易经》已经初步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作战指导原则。第一，进攻要大胆果断。《易经》认为在进攻时如果畏首缩尾，必然导致失败。《晋·九四》爻辞说：“晋（进）如鼫，贞厉。”在攻城方面，《易经》主张抓住时机实施不断的进攻，以争取成功。《同人·九四》爻辞说：“乘其墉，弗克，攻，吉。”攻城者登上城墉，而守城之敌未退，攻者如不抓住时机继续攻打，则城不易被攻下，只有不断攻打，才能取胜。第二，抢占有利的制高点。《同人·九三》爻辞说：“伏戎于莽，升高其陵，三岁不兴。”其意思是说，军队埋伏在莽草丛中，并抢占了高陵——有利的制高点，往往能战胜敌人，并使敌人大伤元气，多年得不到恢复。

《军志》、《军政》

《军志》、《军政》大约产生于西周末期，这或许是史籍所记载的中国古代最早的专门化军事著作——兵书。两书早已散佚，但其中的一些字句则常为先秦的史籍和兵书以及后来的史籍所

引用。

《桩传》有三处引用了《军志》的文字：

《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

《军志》曰：“先入有夺人之志。”

厨人濮曰：“《军志》有之，先入有夺人之心，后入有待其衰。”

唐初军事家李靖引用《军志》的文字：

《军志》曰：“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

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引用《军志》两段文字：

《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陈。”

《军志》曰：“阵间容阵，足曳白刃；队间容队，可与敌对。前御其前，后当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为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进，退无速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

关于《军政》的内容，目前仅见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保留了两句话：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

《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又曰：“强而避之。”

上述引文有的很可能已经过后人的加工，但就其内容看，它们反映的基本为西周时期的军事思想。从这些内容可见，《军志》、《军政》是属于早期条令式的兵书，其军事思想已趋于比较成熟。第一，它们强调“有德不可胜”，主张加强“德治”，做到内部团结，将政治与军事作通盘的考虑，以政治清明为前提，来保证军事活动立于不败之地。第二，主张“见可而进”、

“知难而退”，指出在作战中，要量力而行，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遇到有利的战机，迅速出击，不可贻误战机。第三，主张“强而避之”，指出在作战时，要善于避敌之长，攻其之短。第四，主张“先人有夺人之心”，认为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可以收到摧毁敌人精神、心理的积极效果。第五，肯定正确认识和善于用地形的重要性，“地利为宝”，“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第六，强调军队要有严格的纪律，平时做到“行止有序”，战时做到“止则为营，行则为陈”。这些思想基本上反映了西周时期战争的实际，是这一时期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春秋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在春秋时期得到巨大的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这既表现为在史书和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中，对军事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论述；更体现为《孙子》这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兵书的出现。它们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左传》军事思想

《左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相传是春秋时期鲁国人左丘明所著。后人认为《左传》的作者“于军事特别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因此，把它看成是同《孙子》一样的将帅必读之书，可见其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

《左传》中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观点：

1. 反对“去兵”。《左传》认为战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当时社会上“去兵”议论进行了反驳。如子罕指出：“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韪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这里，子罕肯定了战争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它是威慑不轨行为、伸张正义的工具，国家的

“废兴存亡”，君主的“昏明之术”都是由战争决定的，这又怎么能“去兵”呢？子罕论证了战争在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反映出当时各国统治阶级都竭力保持自己的军事实力，以赢得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战争胜利的心理状态。

2. 对战争性质的朴素认识。《左传》提出区分战争“义”与“不义”的范畴。据成公元年记载，公元前590年，晋国调解了戎和周王室之间的矛盾，使双方达成了和平协定。但周刘康公企图趁戎因媾和疏于防备之际而突然发起进攻，叔服就指出：“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昭公元年记载，楚灵公在篡位前为令尹，服饰、警卫有如国君，他的野心谁都看得出来，当时晋国大夫赵孟、叔向对他作了分析，认为他可以取得一时成功，但不会有好结果：“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夫以强取，不义而克，必以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左传》还以“直”和“曲”两个范畴来说明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提出“师直为壮，曲为老”的思想。

3. 重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左传》吸收了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提出了“无民，孰战”的基本观点。当时不少人从众多胜败兴亡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战争的胜败与民众有密切的关系，并善于从是否得到民众支持这一点去探寻战争胜败的原因。晋、楚城濮之战后，有人分析楚国在此战中的失败原因：“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而晋国之所以在城濮之战中取胜，尽管原因很多，但关键的一点，是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使“民听不惑，而后用之。”最后得出结论：“无众必败”。

4. 提出了一些新的作战指导原则。第一，主张及时掌握战机。齐鲁长勺之战，鲁军实力不如对手，但结果是鲁军一举获胜，鲁庄公尚在莫名其妙，曹刿便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奥秘：“夫

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这里，曹刿提出了掌握战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当选择“彼竭我盈”之时，对敌发起进攻。第二，正确选择攻击方向。《左传》认为攻击的方向应选在敌人的虚弱之处。齐鲁之战中，由于郑国正确选择了攻击方向，故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楚、随速杞之战中，随军违背了这一作战指导原则，结果失败。第三，骄兵必败。《左传》以大量的战例说明了在作战指导上，如果麻痹轻敌，疏于戒备，轻则丧师，重则丧国。桓公四年记载，“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秦作为一个大国，竟败于小小芮国之手，原因就在于“小之也”，即自大轻敌。

此外，《左传》中还叙述了不少具有新的战术思想的战例，如伏击战、包围战、迂回战、侧击战、袭击战，等等。

但是，《左传》毕竟是一部历史巨著，它虽记录了大量的战例，但还没有将其抽象上升到理论。清代李之春说：“孙，吴所言空言也，左氏所言验之于事者也。”局促于经验罗列，表明《左传》军事思想的不够成熟性。

孔子军事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儒家的创始人。他虽不是一位军事家，一生也从未参加或指挥过战争，但作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对当时的军事活动不能不加以注意。这决定了他的军事思想应是其思想体系中一个组成部分。

1. 主张慎战。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慎战的观点。《论语》说：“子之所慎，斋、战、疾”。可见孔子早时对斋戒、战争和疾病是持慎重态度的。孔子这一看法虽很简单，但却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2. 强调教而后战。孔子是一位教育家，不仅重视“文教”，也强调“武教”。他认为要让人民去替统治者作战，首先需让人民接受军事教育。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还说：“善

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在军事教育的内容方面，孔子主张教之六艺中的两项，即射、御。从孔子弟子的作战成绩中，可以看出孔子军事教育的积极效果。如在公元前483年的齐鲁之战中，孔子弟子冉有任季氏将帅，与齐作战获胜，战后季康子曾问冉有：“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回答说：“学之于孔子。”这一事例也表明孔子先教后战的军事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行之有效的。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中国古代军事教育的开展与深入。

3. 要求将领必须足智足勇足谋。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军事将领首先应具有“好谋”善思的素质。《论语·述而》记载：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在这里，孔子赞成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反对那种空手打虎枉送性命的有勇无谋者。同时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军事将领也必须具有“勇”的品质。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提出一个人应有六种品德，其中就有“勇”。但他提倡的勇是“义勇”，他说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即主张“义”和“勇”联系起来，以“义”规范“勇”，这同单纯提倡“勇”有所不同。孔子还强调军事将领必须“足智”。认为“智者不惑”。

4. 主张“足兵”。孔子重视军备，他把“足食”、“足兵”、“足信”列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三项基本措施。《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问答表明：其一，孔子认为国家如能做到粮食、军备充足，老百姓对国家就有信心了。显然，孔子是把“足食”、“足兵”作为“民信之”的必要前提条件来看待的。

其二是关于信、食、兵三者的关系，孔子把“民信”置于立国之首，把“足食”、“足兵”看成是第二位的。其三，孔子强调“民无信不立”，片面地认为只要百姓对政府有信心，国家便会安定，这是主观片面的。其四，尽管孔子提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应该“去兵”的思想，但孔子把“足兵”作为立国的三项条件之一，这仍是他的思想境界高明于当时其他人的地方。

孔子的军事思想虽远未形成体系，但他的某些基本观点，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还是产生过影响的。

《老子》军事思想

《老子》又称《道德经》，相传为老聃所著。老聃，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对《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学术界的意见有很大分歧，我们认为，《老子》书中的个别文字虽然带有战国色彩，但就书的总体思想来看，应该承认它所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晚期的社会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曾被人称为兵书，唐王真说：《老子》“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宋苏辙也说：“……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应该说，《老子》本身不是兵书，而是哲学著作，但《老子》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成败、存亡、祸福”现象的理论总结，这就必须涉及到对军事活动的认识，因此，其中含有较丰富的军事思想是自然的。

1. 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老子》较早地探讨了战争起因的问题。它认为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战争不休的现象，完全是由统治者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引起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为此，《老子》向当时的统治者发出警告说，“故知足之足，恒足矣。”

老子看到了战争的严重后果，指出战争一是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师之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二是造成很多人的伤亡：“杀人之众”。因此，老子认为战争是不吉利的事物，“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处”。表明老子对战争持基本反对和否定的态度。

但老子也承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战争，即“不得已而用之”。但是，就是在“不得已而用”的情况下，老子认为也不应该对战争进行赞扬，更不能以兵逞强，而应“恬淡为上”。他说：“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谓果而勿强。”所谓“果”是指胜利。如果因为战争中取胜而得意，这实际是以杀人为乐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总的来说，老子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是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强天下”。

2. “善胜敌者不与”。从“坏以兵强于天下”的基本观点出发，老子提出在作战指导上所应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为“善胜敌者不与。”他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所谓“不与”，即不和敌人作正面的交战。这一思想和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的思想有一致之处。但老子同时又强调“不争”、“无为”、“不争而善胜”，“无为故无败”，甚至说：“以无事取天下”，这就走向了片面。

3. “不敢为天下先”的后发制人的思想。在作战指导上，老子提出后发制人，以退为进的原则。他说：“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些原理应用到军事领域，其含义就是：要战胜敌方，首先要进行退却防御，然后再寻找时机进攻。所以，他说：“进道若退”，如果只顾进攻，便会陷入死路，“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不过，另一方面老子又过分拘泥于后发制人的观

点、主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只注重防御，而不敢实行有利的进攻，这就把后发制人的作战原则凝固消极化了。

4. “祸莫大于轻敌”。老子强调在战争中要防止出现“轻敌”的思想。指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则哀者胜矣。”敌我兵力相等，哀兵一方之所以取胜，就是因为它能有意甘心于居处不利的位置，从而引起警戒，激起斗志。全力以赴，战胜敌方。

5.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奇”、“正”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一对极为重要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对范畴的内容都有所变化和发展。在老子这里，还没有把“正”范畴运用到“用兵”方面，而是作为“治国”，即政治范畴看待的。运用“奇”、“正”的范畴，把“用兵”和“治国”在方法上的不同作了区别，体现了他对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不同特点的认识。同时，老子看到了“奇”、“正”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提出了“正复为奇”的命题。尽管老子对“奇”、“正”范畴的基本内容，以及如何“以奇用兵”还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但他提出“奇”、“正”范畴和“正复为奇”的命题，这对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充实与发展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范蠡军事思想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人，越国的上将军。《汉书·艺文志》著录《范蠡》二篇，属“兵权谋家”，注云：“越王勾践臣也。”这说明，范蠡的著作是作为兵书流传于世的。此书自汉以后失传。我们今天只能从《国语》、《吴越春秋》等史籍中，寻找到某些有关内容。

范蠡提出“随时以行”。所谓“时”，作为军事科学的范畴，是指时机或曰战机。“随时”，就是依据时机是否有利来决定作战行动，这也叫“守时”，“随时以行，是谓守时”。范蠡的“随

时”，“守时”，实质上包含有两层基本意思：其一是指“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条件还不具备时，不能勉强出兵作战，这时，应“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如果时机不成熟而盲目出兵作战，那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这就叫做“强孥”，“强孥者不祥”。其二是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这是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遇到有利的时机，就不能犹豫不决，而应以最快的速度去进攻敌人。他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惟恐弗及”。因为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得时不成”，“反之为灾”。

范蠡还提出“因”这一范畴。他说：“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所谓“因”，就是指根据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决定作战行动。他说：“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用则阴，先胜则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善于带兵打仗的人，在作战指导上，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原则的不同应用，都是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实行后发制人的原则时，要取法于阴象，即沉着应付，不动声色；而在先发制人时，就要取法于阳象，即迅猛进攻。他还说：“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这是说，如果敌向我进攻，我在不利的情况下，应先固守，待有利时机出现，再作反攻，在对敌人反攻时，必须全面考察敌方是否遭到了自然灾害，以及老百姓的“饥饱劳逸”等情况，以避免敌人的有利条件，然后再实施打击。从这里可以看出，范蠡和老子在军事思想方面是有所不同的。老子在讲进退、刚柔、先后时，无条件地强调退、柔、后的一面，而否认进、刚、先这一面。范蠡则主张应根据战争条件的不同，或进或